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两宋辞赋史

(下)

刘培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两宋辞赋史

(下)

刘培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宋辞赋史/刘培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209-06090-5

I. ①两… II. ①刘… III. ①赋—诗歌史—中国—宋代 IV. ①I207. 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0783 号

责任编辑:张 丽

装帧设计:蔡立国

两宋辞赋史

刘 培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43.5

字 数 6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090-5

定 价 86.00 元(上下)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0539)2925888

目 录

导 言	1
-----	---

上 编

第一章 发轫期:宋初辞赋创作探析	13
第一节 论北宋初期辞赋的特征	13
第二节 宋初的颂美讽谕赋	26
第三节 宋初的抒情言志赋	37
第四节 《事类赋》简论	46
第五节 田锡辞赋的新变	52
第六节 王禹偁辞赋对风雅传统的发扬光大	61
第二章 宋赋面貌的初步确立:北宋中期辞赋的新变	75
第一节 论北宋中期辞赋的特征	75
第二节 雍容闲雅的治平心态的流露(上) ——晏殊、夏竦等人的辞赋创作	93
第三节 雍容闲雅的治平心态的流露(下)	

——宋庠、宋祁的辞赋创作	101
第四节 辞赋中淑世精神的张扬	111
第五节 屈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上)	
——蔡襄、王令诸人的骚体创作	131
第六节 屈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下)	
——郭祥正、王安石、文同的骚体创作	144
第七节 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163
第八节 文赋的形成	179
第九节 覃思精微 深远闲淡	
——论梅尧臣的辞赋创作	196
第十节 欧阳修对赋境赋艺的开拓	204
第十一节 情理兼备的学人之赋	
——刘敞、刘攽的辞赋创作	215
第三章 趋向高雅:北宋后期辞赋的演变	228
第一节 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	228
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	249
第三节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260
第四节 北宋后期文人的文化生活与辞赋创作	269
第五节 苏轼辞赋的集大成特色	279
第六节 苏辙的辞赋创作	295
第七节 黄庭坚的辞赋创作	301
第八节 平淡清旷 意蕴深邃	
——论张耒的辞赋创作	315
第九节 晁补之辞赋对屈骚传统的变革	322

下 编

第四章 继承与新变:南宋初期辞赋的发展	339
第一节 两宋之交辞赋的传承与递变	339
第二节 两宋之际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368
第三节 论南宋初期的爱国辞赋	392
第四节 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	411
第五节 国运转关与文风嬗变	
——以李纲辞赋为中心的考察	433
第六节 自恨空漂泊 无由见老成	
——论周紫芝的辞赋创作	452
第五章 骋才使气与淳厚渊雅:南宋中期辞赋的繁荣与风貌的确立	467
第一节 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特征	467
第二节 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499
第三节 论南宋中期辞赋骋才使气的创作倾向	522
第四节 屈骚传统的多角度解读	
——南宋中期骚体创作新貌探析	541
第五节 深厚淳质 植意卓绝	
——论杨万里的辞赋创作	565
第六节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	
——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578
第六章 表现生活与重塑人生:南宋后期辞赋的发展轨迹	595
第一节 论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	595

第二节 正心诚意 修辞立诚

——论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文学精神的规范与重塑 619

第三节 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审美风范的规范与重塑 640

第四节 身闲冷看世人忙

——论刘克庄的辞赋创作 660

主要引用书目 669

后 记 676

下
编

两宋辞赋史

第四章 继承与新变：南宋初期辞赋的发展

第一节 两宋之交辞赋的传承与递变

靖康二年（1127），金人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宫妃等三千人北去，北宋灭亡。不久，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之后，高宗赵构一意避敌，逃往江南，在金人的追打之下失魂落魄，狼狈不堪，在江浙一代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波折，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临安府为行都，南宋政权才逐渐在江南立住阵脚。

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局，大臣们本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那只是我们读史者的一种奢望，两宋之交的为人臣者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党论四起、攻讦不已的胡乱局面。靖康之难，给元祐党人攻讦执政的新党提供了绝好的口实。大臣们围绕着和与战，夹杂着浓烈的党同伐异的意气，掀起了更为激烈的纷争。在懦弱卑劣的高宗看来，当务之急是把让皇家失尽颜面的那一页屈辱历史翻过去，重新树立皇家的尊严，使国体保存下来，站稳脚跟，争得喘息的机会；加之当时宋军战斗力极其低下，遇敌时往往望风解体，而且江南一代地方不靖，群盗蜂起，依靠这样的资本来和金人决战，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和议一直是高宗思想的主线。秦桧南归，君臣一拍即合，和议之计遂定。但是，从当时的政治形态来看，新旧两党积怨极深，形同水火，和与战作为他们政治斗争的主要话题，很难有调和的可能，加之高宗的年轻和卑怯，秦桧的深于权谋、居心险恶，自然难使天下

归心。总的说来，面对国难，高宗朝的君臣们没有在颠沛流离和家国之痛中振作起来，形成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共恤国难的局面，始终是在苟延残喘中互相攻讦、度日偷生，和议之局面换来的积极作用丧失殆尽。高宗时期的学术、文学思想与这种政治格局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当时的辞赋创作来看，大多数赋家身经靖康之难，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和颠沛流离之苦，他们的辞赋，很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心理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文人的思维定式。因此，我们将靖康之难以来的高宗统治时期作为南宋辞赋发展的初期。

从帝王世系、基本国策、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以及政治、学术的发展等方面来看，南宋政权与北宋并无多大变化，其政治格局、学术文化基本是对北宋后期的延续。具体到辞赋创作，南宋绍兴年间的辞赋也是对北宋后期辞赋的传承发展。不过，南宋政权偏安一隅，风雨飘摇，前朝的雍容气象荡然无存，时局的巨变使得当时的学术和士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影响到辞赋创作对北宋后期辞赋风尚的传承以及自身的递变。

南宋初期学术、士风的变化与更趋严酷的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靖康之难给在徽宗朝备受打压的“元祐党人”提供了全面反击的绝佳机会，他们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异常激动地开始全面清算熙宁以来的政治和“荆公新学”，掀起了一次次激烈的党争狂澜。而高宗则施展君人南面之术，频繁地更换首辅，以实现新旧两党的权力制衡，从而引起政坛的长期动荡。起初，高宗倡导“元祐学术”，在确立了和戎的国是后，又和秦桧一起打击道学，对道学党实行“党禁”。但是，经过绍兴年间的政坛沉浮，“元祐学术”中的二程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胡安国的《春秋》学因其标榜“尊王攘夷”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呈现遍染士林之势。两宋之际的党争比以往更为残酷，为了置政敌于死地，他们往往不惜深文周纳、信口雌黄。在秦桧独相的十几年间，植党专政，对异己者的打击报复、对党同者的猜忌挟持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恶劣的政治生态营造出人人自危、如履薄冰的政治氛围，造就了文人卑劣猥琐、寡廉鲜耻的文巧习气。

两宋之际学术、士风的演变促成了辞赋创作的转变，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南宋初期辞赋留存于世者近300篇，其表现出的对北宋后期的传承、递变轨迹相当

明显，我们打算从六个方面讨论之。

一、辞赋中悲凉之气的递变与深化

北宋后期由于党争的进一步意气化，文人的参政热情消退，如履薄冰、畏惧祸端的心理弥漫士林，悲凉之气也逐渐浸淫于文学作品中，慨叹人生、反思命运成了文坛的主调。徽宗朝，以“丰亨豫大”为口号，人为地营造盛世的氛围，借以打压异论，排斥异党，其结果，是除了空洞的歌功颂德的辞赋大行其时的同时，表现深沉的人生苦难和人生漂泊的辞赋勃然而兴。

南宋初期文人的政治环境与北宋后期文人相比不仅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更加恶劣。围绕着和与战的国是之争，朝堂上掀起一次次更为猛烈、涉及面极其广泛的党争，而且，斗争的手段更为阴险毒辣。秦桧专国期间，以和戎的国是打压党议，控制台谏，鼓励告密，手段比蔡京当年更为残酷，必置政敌于死地而后快。对其党羽的举动也严加监视，因而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文化恐怖的结果，是出现了告密风行、文丐奔竞的局面，在这样的境况下，为了身家之计，一些文人不得不出卖灵魂以期飞黄腾达。迎合国是和当道者的谀文成了绍兴年间文学的主旋律，文人们内心的悲凉可想而知。

南宋初期的文人大多经历了国破家亡、流离播迁之苦。靖康之难后，北方文人纷纷南逃，这些人是南宋初期赋坛的主力。而且到南方后，处境依然非常糟糕，当时“天下州郡没于胡虏，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①，“而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②，这样的遭际对于文人来说肯定是刻骨铭心的。

和北宋后期文人类似的政治处境，使南宋初期赋家有着与北宋后期文人一样

① 庄绰：《鸡肋编》卷中“绍兴军费”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页。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以人为粮”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页。

的忧惧宦海沉浮的心理态势，而且大多有过身似飘萍的体验，因而，南宋初期的辞赋继承了北宋后期辞赋惯常表现的对人生的悲凉之感，而且程度更深。

悲秋是文学中用以表现生命感受的主要题材之一。北宋后期到南宋初期，赋家中秋士不少。北宋后期的咏秋之作多流露出悲凉的情绪，如毛滂的《拟秋兴赋》、周邦彦的《续秋兴赋》、张耒的《秋风赋》、孔武仲的《鸣虫赋》、晁补之的《江头秋风辞》等等。当时邢居实的《秋风三叠》因其表现的孤独悲凉情感反映了盛世的氛围中文人对时局的无奈和灰心，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许多文士纷纷题跋呼应。两宋之交，咏秋之作依然非常多。如李纲的《秋风辞》、苏籀的《秋辞》三章、刘一止的《秋郊赋寄友人》、郑刚中的《秋雨赋》等，都是当时比较出色的咏秋佳作。这些作品的悲秋情绪承接邢居实赋的悲凉情绪，而且对秋天的感受更为悲怆深沉，我们很难找到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秋阳赋》所表现的那种淡泊旷远的襟怀了。刘一止的《秋郊赋寄友人》就很有代表性，赋作首先表现了情绪的低回落寞：“日曷曷而逾厉兮，天迢迢而益高。潦水收而泓渟兮，微风过而萧条。秩爽思以遐鹜兮，逝幽怀之远飘。神旺旺而直上兮，意渺渺而独超。悼时运之不留兮，嘉节物之见邀。莽四野其无人兮，兀平岗之岩峩。惊独鹤之清唳兮，咽残蝉之三噉。燕如客而归告兮，雁哀鸣以求曹”，接着表现了孤独无依的生命状态和对人生价值的反思：“繁境会而情感兮，伤志大而形么。独相羊以无匹兮，起怅望而翘翘。嗟佳人何之兮，倚翠袖而若招。思夫君而不可见兮，挽蓬首而屡搔。岁月骏骏而随往兮，怅此情之不自聊。亦何忧之不臻兮，绪轧轧其如縲。总事业之无闻兮，想富贵之不能徼。将今世之舍旃兮，盖令名之勿劬。力古人而愿学兮，泝千载而上交。嗟人生之南北兮，况截道之惊飚。顾筋力能几许兮，苟比年而远徭。曾一饱之不谋兮，岂吾分之已叨。世种种其奚数兮，信我行之每劳。”作者把对未来的期盼比作佳人对夫君的期盼，把自己的落魄比作佳人的首如飞蓬，相当传神。赋中考问人生上下求索的意义，富贵不可求，忧愁如縲丝，否定了积极追求的人生态度。赋中蕴含的对现实人生的无奈和绝望是极其明显的。其实，这种消沉甚至颓废的人生态度在南宋初期的咏秋辞赋中普遍存在，它是北宋后期咏秋辞赋悲秋情绪的进一步深化。

北宋时期，较早用赋的形式慨叹身世的是宋祁的《卧庐悲秋赋》、《穷愁赋》、《悯独赋》，宋祁未登第时生活极其困顿，所以在富贵以后就一次又一次地在创作中追忆早年的生活，流露出伤悯和自怜的种种情绪。可能和时代的悲凉氛围有关，北宋后期，慨叹个人身世的赋作逐渐多了起来，像谢逸的《感白发赋》、晁补之的《求志赋》、张耒的《问双棠赋》、程俱的《怀居赋》^①等等，多以一种感伤的情怀来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而且多对仕途的不得意颇感无奈。如程俱的《怀居赋》写道：“由裸蝼以迄今兮，与日月而竞驰。曾谋食之不遂兮，岂云道之敢营。异匏瓜兮可系，羨侏儒之太仓。怀铅刀兮一割，感二鸟之宠光。耕兮不足以卒岁，仕兮不能以安亲。徒遑遑兮羈旅，操危心兮若零。”对命运的不偶很是愤愤不平。在“乱”中又写道：“禀气不妩，命不偶兮。进以分寸，退寻丈兮。三年以仕，七年饥兮。”像这样在赋中表现对仕宦的汲汲以求，在南宋初期的辞赋中几乎看不到，从总体来看，南宋文人对仕途的追求可能更为狂热，但是他们在文学中却很少表现，这可能与他们对仕宦的看法已经彻底失去了北宋文人的那种大济苍生的崇高感有关。经过靖康之难的颠沛流离，两宋之交的赋家则是以一种凄苦悲怆和人世沧桑的感慨来追想当年的。晁公遫的《悯孤赋》命意颇类宋祁的《悯独赋》而更多切肤之痛。靖康元年（1126），年仅十岁的公遫和兄公武等家人随父晁冲之逃离汴京，流落在江浙一代，翌年，父亲病死宁陵，此赋就是以这一流亡过程为线索行文的。赋作追述靖康难中一家人的逃亡生活道：“豹舄舄而眴关兮，宇将颠而藩墜。心怔怔而横骛兮，撰余辔于睢之阳。朝发轫而南迈兮，惨去故而尽伤。睨帝闾以增遐兮，日沉翳其无光。岑石摧其重輶兮，豺狼踣夫中路。夕惴惴而不寐兮，昼徙倚而环顾。察九土之洪旷兮，予何为此窘步？”夷狄叩关，举家播迁，以天地之寥廓，却找不到容身之地，作者的浩叹道出了当时流浪者普遍的心理。“俄魏狸之涉泗兮，赤囊翩其若翰。幼遭世之厄艰兮，尚童羈而未冠。后猓獠之淫噬兮，前大江之奔湍。睇鰲渊之赫怒兮，柵将进而复

^① 赋序称“实自始生之年，今兹二十有八年（虚岁）矣”，据《宋史》卷四四五本传，程俱生于元丰元年（1078），那么此赋当作于1105年，即徽宗崇宁四年。

止。委虎蹊以颠越兮，恐齑恨而永已。冒危途以徼福兮，寄性命于一苇。”赋中谈到在建炎年间金兵深入淮泗追击高宗时的情形，当时家里盘缠用尽，前去大江，后有追兵，因此，这个年仅十岁的孩童连一死的念头都产生了，内心的绝望和悲苦可想而知。接下来，赋详细描写了冬天在饥寒交迫中辗转江浙的苦况。赋中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浩叹：“昊苍何其不仁兮，而畀予以弱质。哀坎毒而岂忘兮，惧鞭笞其难必。”这篇赋用一个少年的眼光和感触，细致地描写了那个乱世给普通人带来的苦难，是当时少见的啼血号天的佳作。同样的作品还有李处权的《梦归赋》等。

南宋初期的文人所经历的苦难要比北宋后期的文人深重得多，他们对人生、死亡的体认也更深刻、更彻底，更具有出离悲情的平静抑或麻木。当苦难、屈辱沉重到让人无法承受、无法咀嚼回味的时候，人们只能以麻木甚至颓放来化解了。

北宋后期辞赋中有许多表现宦海风波、忧惧仕途浮沉的作品。晁补之的《梦觐赋》、《坐愁赋》和唐庚的《省愆赋》努力排遣对政治斗争的忧惧；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通过齐物达观的观念来忘却贬谪的悲苦；蔡确的《送将归赋》则详尽铺陈贬谪的悲凉失落心态；谢逸的《吊槁杉赋》则表现世道的险恶、人心的叵测。而南宋初期，文人对政治上的失意和贬谪岭表能够泰然处之，经过元祐以来你死我活的党争和蔡京、秦桧等权臣的恐怖文化专制，文人们对政治把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在官言官，在江湖则言江湖，能够马上适应自己在官场中扮演的角色，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处境，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以平静得近乎麻木的心态来对待官场的得失。李纲的《三黜赋》、张九成的《谪居赋》就很好地诠释了文人心态的这种变化。张九成的赋虽然把贬谪的心境写得很绝望：“奇祸作兮湘江奔，天忽崩兮骨欲折。心糜溃兮目流血，日月驰兮成永诀。”把谪居的地方写得很可怕：“维兹地兮古横浦，岭之北兮江之浒，团瘴烟兮飞雾雨。”把谪居的生活写得很孤独：“七年于兹兮无与晤语，俗目并观兮吾何以处。”但是，他对这种种的不快并没有完全在意，赋中写道：“夏葛冬裘兮何用美，饥食渴饮兮无求备，神明昌兮穷不讳，道义重兮物偕逝，悠哉游哉，聊以卒岁。”这并不是故作旷达，这是作者心理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文人贬谪心态的

真实表现。胡寅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贬居新州时著《论语详说》，序言这样写道：“适有天幸，投畀炎壤，结庐地偏，尘事辽绝，门挹山秀，窗涵水姿，檐竹庭梧，时动凉吹。朝夕饭一盂，蔬一盘，澹然太虚，不知浮云之莽眇也。”^①把贬谪生活描写得极有诗意，可以作为张九成赋的很好注脚。这种心态固然与对江南的开发有关，谪居地不再如以前那般荒蛮不开化，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谪居心态的变化。

北宋后期，用骚体写成的哀辞是相当多的，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对亡人品格的赞美，如吕本中年轻时作的《六子哀辞》就很有代表性。南宋时期，骚体哀辞、祭文、招魂辞明显增多，而且，一些作品不是对亡人的旌表，而是描写招魂的内容或者天堂生活的美好。葛胜仲的《祭刘尚书文》以招魂的形式写成，作品写到亡人生前的落魄，死后应该安享快乐，希望死者的灵魂能够回到亲人身边，享受家庭的和美，然后写道：“生一世若大梦些，祸福寿夭皆幽运之所系些。箠中牖下，均一死些。魂兮归来，跂足以俟些。”以一种极其达观的态度来对待生死。其他如葛胜仲的《祭施氏妹恭人文》、李纲的《祭文李孺人氏》、葛立方的《祭莫彦济文》、许翰的《陈欧二修撰哀辞》和洪适的几篇祭文等，多在着意表现死者生前的磨难、祈求亡人在天堂能够享受快乐的生活。史浩的《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辞》是以几千言的笔墨来铺排灵魂生活的美好，希望列祖能够永享安乐。吴芾的《自祭文》更是一篇对生死彻悟的佳作，它深受陶渊明《自祭文》和《挽歌诗》的影响，但是增加了对阳世美好生活的描写：“既归林下，获脱羈鞅。终日笑傲，饮酒赋诗。山湖照映，妻子追随。时擎小艇，游于涟漪。临风对月，其乐无涯。”对自己的一生甚为满足，但是认为应该知足，不应过于留恋人间，因此又写道：“如我长命，在世亦稀。若不知足，将欲何为！若更不死，又待何时！”而且作者把死后描写得非常富有诗意：“且有精舍，在旁护持。花竹竞秀，泉石争辉。魂魄时游，亦足自怡。”这样，生与死的界限就被消解了。对生死看法的这种变化，折射出流落失所出生入死的文人们对人生和死亡的深彻感悟以及

^① 《全宋文》第18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对人生的悲悯情怀。

需要指出的是，每当国家乱象丛生之时，表现漂泊的征行赋就会大量产生；国破家亡之际，像庾信《哀江南赋》之类的作品不乏其作。北宋后期，由于苦难时事的影响，征行赋的创作呈现高涨趋势，但是，南宋以后，表现征行伤时的作品却很少，除了上引晁公遡的《悯孤赋》和李纲的《南征赋》涉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外，类似《哀江南赋》这样表现亡国之痛的作品几乎没有，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靖康之难来得太突然，文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国家就已经覆灭了，因此没有时间去细细咀嚼亡国之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靖康之难的耻辱和当时文人的文化认知反差太大，他们根本没有面对那段伤痛的勇气，更谈不上去痛定思痛了，哀莫大于心死，于是，尽量不去追忆那段屈辱的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政者为了皇家的尊严计，有意回避那段历史^①，于是朝廷上下朝堂内外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家尽量不去戳动那块心灵深处的伤疤，在有意遗忘中获得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勇气。

二、辞赋的歌功颂德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与表现悲凉情绪的辞赋并行不悖的，是歌功颂德辞赋在南宋初期的大行其道。辞赋的这种风尚，也是对北宋末期辞赋颂美风尚的继承和发展。

徽宗是个相当庸劣的皇帝，无治理国家的才能却一心想体验盛世天子的滋味。蔡京秉政时，控制台谏，打击异己，曾经三次籍定“元祐奸党碑”，根除一切旧党势力，新党一统天下。“崇宁党禁”的结果，是人皆畏祸，莫敢庄语，谀文盛行，颂声四起，人为地营造了一个“盛世”局面。不仅是对朝臣，当局对科场的控制也极其严厉。洪迈就指出：“蔡京颺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②，对学术的禁锢之严由此可见一斑。在宣扬“盛世”的同时，徽宗在汴京建造宫观楼阁

^① 南宋初期禁止私家撰史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掩盖那段屈辱的历史，以重树皇家的威严。

^② 洪迈：《容斋随笔》（上）《三笔》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76页。